

桑学成 刘长江 主编

开辟有中国特色的 党建之路

人民出版社

开辟有中国特色的党建之路

桑学成 刘长江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开辟有中国特色的党建之路

桑学成 刘长江 主编

责任编辑：安晓崃

出版发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哈尔滨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电话：0451-2308057

印刷：海军指挥学院印刷厂

开本：787毫米×1168毫米 1/32

字数：22.5万字 印张：13.65

初版：1992年11月 印数：1—2000册

国际统一书号：ISBN7-207-05076-3/D·661

定价：26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在步入 21 世纪的第一个年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 80 周年华诞。

中国共产党的 80 年是为着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创造了举世为之惊叹的人间奇迹的 80 年。党在 80 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不渝地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在幼年时期,党就把“党的建设”写进了自己的章程。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经验时,曾经把党的建设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并列为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党更是十分重视党的自身建设。经过 80 年的不断建设,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由一个初创时只有 50 多人的小党发展成为拥有 6451 万党员,领导全国近 13 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伟大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建设、不断壮大的历史。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80 周年之际,一部新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建设史的著作——《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党建之路》出版了。这是一部以新的方法按新的体例研究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历史的著作,阅读之后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国的理论工作者对中国共产党建设史的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的 80 年代末。已经出版的著作一般是按照编年史体例撰写。这些著作对中国共产党建设史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和推动性的作用。但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讲,正因为已经出版的党建史著作具有

开创性的作用,其研究显然还缺乏对党的建设史在学科意义上的准确定位与研究的深度。

与已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建设史相比,由桑学成、刘长江主编,近10位党史、党建研究工作者合作撰写的《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党建之路》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党建之路》没有沿用编年史的方法和体例,而是紧紧抓住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古老文化传统,同时经济又极端落后的国家应该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如何建设一个具有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关键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形势和任务,如何不断对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大胆探索,如何根据中国国情寻求解决党的建设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有效方法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从而勾画出一副生动而又真实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具有中国自身特点的党的建设道路的历史画卷。读完本书,自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共产党以不断探索和大胆创新的精神开辟了中国自己的正确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同时中国共产党也以同样的精神开辟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党的建设的道路。也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在不断地进行探索,特别是党的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国共产党才能够经受住一个又一个的严峻的考验,不断在党的建设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本书因为抓住了在中国应该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怎样建设一个具有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关键问题,其体例也就有了新的特点。本书分为十部分,每一部分实际上围绕党的建设80年历史中的一个最能够反映某一时期党的建设特点的问题展开,读来使人对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探索与创新有一种新的感受。而每一部分标题的设置也表现出作者对中国共产党80年建设历程的深刻认识与准确把握。

真实地反映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程,从理论上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是本书又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点。书中不断提出

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正确认识的问题为什么仍然会在实践中发生偏差,这毫无疑问表明了作者在历史研究方面所努力要实现的超越,即不但要说明历史实际上是怎么样的,还要尽可能地说明历史为什么是这个样的。作者在真实再现中国共产党 80 年建设历史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对党的建设历史的理解,而作者在提出自己理解的同时,也留下了给读者进一步思考的空间。这在以往的同样类型的著作中是不多见的。

当然,《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党建之路》也并非没有缺点。有的部分给人的印象是,写作似乎过于仓促,材料取舍与理论上的分析都有值得进一步斟酌之处。不过瑕不掩瑜,不足之处与本书所显示的新的特点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将来能够再版,相信作者会以自己的努力使这本有自己特点的著作更加出色。

2001 年 6 月 6 日

目录

序.....	(1)
一、在中国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	(1)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1)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7)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讨	(10)
中国共产党创建任务的完成	(15)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特点	(20)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经受考验	(23)
二、探寻有中国特色的党建之路	(29)
党的建设从公开转入秘密状态	(29)
党的建设重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	(37)
毛泽东建党思想初步形成	(39)
“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党的建设的曲折与困境	(48)
教条主义建党模式的摆脱	(58)
三、建设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70)
党走出了狭小的圈子,成为全国性的大党	(71)
毛泽东建党路线的基本确立	(75)
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而奋斗	(81)
毛泽东号召“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85)
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多方面展开	(88)
延安整风运动:党的建设的伟大创举	(93)
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中党的建设理论体系的形成	(100)
四、在两种命运的决战中整党建党	(108)
党的建设重心心的变化	(108)
结合土地改革进行整党运动	(115)

调整国统区党组织与建设强有力的地下党·····	(123)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加强与组织制度的健全·····	(130)
大规模的干部调配与培训·····	(138)
七届二中全会: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提出·····	(143)
五、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而奋斗 ·····	(150)
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确立·····	(150)
开展整风运动和进行党的基层组织的整顿·····	(153)
密切联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建设党·····	(167)
执政党建设历史经验的初步总结·····	(183)
六、探索执政党建设的道路 ·····	(189)
中国革命的遗产与斯大林模式·····	(189)
未达到目的的整风运动·····	(198)
领导体制与领导方式的变革·····	(211)
民主集中制:理论上的发展与实践中的曲折·····	(221)
在探索中步入歧途·····	(233)
七、动乱年代党的建设 ·····	(244)
“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建设遭受挫折·····	(244)
错误的建党纲领指导下的党建实践·····	(252)
纠“左”与党的建设出现暂时转机·····	(278)
全面整顿与党的建设局面好转·····	(278)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283)
八、在拨乱反正中开始新的探索 ·····	(288)
“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创伤与党面临的抉择·····	(288)
徘徊中的论争与选择·····	(295)
历史性转折与党的思想建设上的拨乱反正·····	(302)
大平反与组织建设上的拨乱反正·····	(310)
新的探索与党建理论的新发展·····	(316)
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的最初成就·····	(322)
九、在继承与变革中前进 ·····	(331)

确定新时期党建目标·····	(331)
改革中的整党·····	(340)
为党风好转而努力·····	(346)
在继承与变革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353)
思想战线的分歧与斗争·····	(367)
在深化改革中推进党的建设·····	(371)
十、回归与超越 ·····	(381)
风云变幻的时代对中国共产党的挑战·····	(38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与发挥党的政治优势·····	(387)
改革开放新局面与党的建设新发展·····	(398)
迈向新世纪的政治宣言和政治纲领·····	(407)
奠定新世纪党的建设的基础·····	(414)
后 记 ·····	(430)

一、在中国创建 马克思主义政党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它创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初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这两件大事,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日渐结合,从1920年初开始,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多方面展开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一方面,他们相继成立了一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另一方面,依据马列主义的政党学说,对如何在中国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了广泛的理论探索。1921年7月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语)。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这个命题卡尔·考茨基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作过论述。在他之前,1888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海因菲尔德召开的建党大会通过的纲领已经阐述过与此有关联的思想,指出党的任务是要把认清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列宁肯定了这个命题。他在1900年写的《我们运动的迫切

任务》中即以党是“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这一命题立论，批判了经济派；其后，他写了《怎么办》这部著作，对这个命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证。

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它的成立是以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前提的。没有工人阶级及其斗争，不可能有工人阶级的政党。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也并不是有了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就能够成立这样的党，因为党不是如同工会那样的工人群众组织，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不是消极地为每一个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而是要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指出政治任务，保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①为此，它要通晓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规律，并以对这种规律的认识来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胜利的革命战斗。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用科学社会主义把工人阶级武装起来，以便从中造就出一批有阶级觉悟的先进战士。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建立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马克思曾经讲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要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单靠理论批判是不够的，理论只是为革命提供的批判的武器。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1847年，马克思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就是引导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在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最初都是互不相关的”，这“使得两者都软弱无力，难以发展。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工人的阶级斗争才能成为无产阶级争

^①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08页。

取自身解放,摆脱有产阶级的自觉斗争”。由于这种结合,“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高级形式……独立的民主主义工人政党也就产生了”。列宁还指出,“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上形成的,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①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客观的、有规律的,具有一定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这种结合具有不同的历史进程和不同的民族特点。那么,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条件是怎样形成的呢?

首先,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长期是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国家。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解体,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工业和中国工人阶级产生和发展的过程。19世纪中叶,在外国资本在中国创办的企业中,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产业工人;60年代和70年代,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和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中,出现了中国第二批和第三批近代产业工人。与西方的情形不同,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同时产生的。在中国,是先有工人阶级,后有资产阶级。比之后者,它的资格更老些,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除了具备世界一般工人阶级的优点,即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和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其独具的特点和优点:第一,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具有改变自己悲惨遭遇的强烈要求;第二,中

^①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09页。

国工人阶级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各省和一些大企业中,这种相对集中的状况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团结;第三,中国工人阶级绝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因而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正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具有这些特点和优点,因此从其一诞生起,就开始了反抗剥削和压迫的革命斗争。1844年,香港工人为反抗英帝国主义的“人头税”法案举行了罢工斗争。1858年,香港、澳门工人为反抗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又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斗争。此后在孙中山领导下,工人阶级的斗争此起彼伏,有了较大的发展。据统计,从1912年到1919年,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罢工斗争有130多次。仅1919年五四运动前数月内,就发生了31次罢工,数万人参加。特别是五四运动中工人罢工斗争,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检阅了自己伟大的阶级力量。邓中夏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开始于这一次,它启示了工人,认识了罢工的威力,对后来中国工人阶级能发展成为自己阶级的独立力量与独立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①这个情况表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具备了良好的和坚实的社会阶级基础。

其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但是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其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得益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事变。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全世界树立了一个榜样,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6月第二版,第44—45页。

也给正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极大的鼓舞,使他们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

俄国人给我们送来了社会革命的先进思想武器,还得有中国社会内部出现相应的条件,才能得到广泛传播和生根开花。这些重要的内部条件,除了工人阶级队伍的日趋壮大和工人运动和日益高涨外,便是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提供了物质条件。这也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者。”^②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看,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同时,它又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以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虽然还没有共产党组织,但是已经有了一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独特的作用。在这批先进分子中,李大钊是杰出的代表。1918年7月1日,他在《言治》(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颂扬了十月革命,并表示欢迎十月革命的新曙光。同年11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进一步歌颂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初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并满怀信心地断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91年6月第二版,第1470—147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91年6月第二版,第1515页。

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①在他的主持下，《晨报》副刊还陆续刊载了马克思主义的译文。与此同时，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也开始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种种迹象表明，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

第一，各地出现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据统计，1919年至1920年，在全国400余种报刊中，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就有200余种，其中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较大作用的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湘江评论》、《新社会》、《少年世界》等。到1920年，国内已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民族自决》、《过渡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国家与革命》等近20种马、列原著。

第二，各地成立了一批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初步形成了一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李达、李汉俊、杨匏安、陈望道、邓中夏、张太雷等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同时，全国相继成立了一批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如：1920年3月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成立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创办的长沙文化分社，1920年9月成立的长沙俄罗斯研究会，1920年2月成立的武汉利群书社等。

如果说，在五四运动之前，当人们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之后，曾经在资本主义的死胡同里徘徊过，那么，五四运动之后这个死胡同的墙壁被推倒了，人们这才进入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这就为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①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页。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1920年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多方面的努力,进入了组织建党阶段。中国建党活动首先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工人运动发展较快的东部城市,在中国留学生较多的日本和欧洲也有建党活动。由于中国的建党活动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加之缺乏经验,又没有及时协调,因此,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没有统一的名称,活动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直称“共产党”。后来才冠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称谓,并作为惯例沿用多年。至于建党活动的方式,因各地政治环境差别较大,有的以开会的方式宣告建党,也有的以个别联络的方式秘密组党。尽管各地的名称和方式有所不同,然而建党的方向和原则是一致的。各地党组织的创建,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中国最早酝酿创建共产党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1920年初,他们就在北京探讨过中国建党问题,并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展开建党的准备工作。1921年3月,李大钊在《团体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指出:中国改革事业要靠着民众的势力,而民众要靠团体去组织训练。俄罗斯共产党,党员60万人,以60万人之活跃,而建成了一个赤色国家,所以我们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而是贫民的劳动家的政党,而是社会主义团体。这个团体是由“C派朋友”成立的一个坚固的精密的组织,在国际上以第三国际为之中枢。1921年4月,陈独秀在《共产党》月刊第三号上刊登一篇主要译文《加入第三国际大会的条件》,传播了列宁的建党思想,1921年7月又在第六号上刊登了共产国际二大的主要文件《第三国际共产党第二次大会的宣言》,所有这些都帮助了正在着手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了解共产党的基本知识,筹建党的早期组织。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得到了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值

得一提的是,1921年3月,经共产国际批准派出的俄共(布)党员小组魏经斯基等人来到中国帮助建党。魏经斯基首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4月,经李大钊介绍,魏经斯基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筹备,终于于8月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中心的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俞秀松、陈望道、赵世炎、施存统等,陈独秀被推为书记。上海共产党组织是全国建党活动的中心,在筹备建党的活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大部分地区党组织的建立,都与上海有着直接的联系,有的则是上海党员到外地去帮助创建的。同年10月,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张申府、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张太雷、何孟雄等,李大钊被推为书记。从此,南方的建党活动主要由陈独秀指导,北方的建党活动主要由李大钊指导,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互通情况,交换意见,因此,人们当时就有“南陈北李”之称。从1920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也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另外,已在国内加入党组织的张申府、赵世炎等人于1920年下半年赴法国从事建党活动,于1921年春成立了“巴黎小组”;施存统、周佛海在上海加入党组织后,先后去日本留学,并成立了“日本小组”。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已达8个。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标志着在中国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开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为统一建党思想,促进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一,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在中国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探讨。为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上海小组于1920年11月创办了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阐明党的基本主张,并以大量篇幅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和俄国共产党的经验。12月,上海小组还制定了一个《共产党宣言》的文件,反映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建党主张。《宣言》明确提出:要组